

龚自珍与沈曾植

——沈曾植两篇有关龚自珍的未刊文稿述评

钱 仲 联

龚自珍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员先锋大将，特别在诗歌方面，影响到“诗界革命”派的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以及后来“南社”诗人；沈曾植则是“同光体”的魁杰，后期浙派诗的大宗师。两者表面看来毫无共同点。如果说有共同点，那也只是学术上的，如龚为段玉裁外孙，治经学，通公羊春秋，通史学，通天台宗佛学，治西北舆地等等，是道地的学人；沈也是少年即通乾嘉诸家之说，二十六岁后即治东三省、内外蒙古、新疆以及南洋舆地之学，沈亦谓不可讳言公羊，孔子言志在《春秋》（见《护德瓶斋客话》），四十岁前后即治佛学，并广博到各种学术，为近代杰出的魁儒大师，远远超越龚的范围，而二家为学人则一。“同光体”的诗人，侈言合学人与诗人之诗为一，龚、沈在这方面，可以说是有共同点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客观地泛说，并无具体的材料证明龚、沈之间的必然联系。相反，就我以前所知道的沈曾植诗歌理论，四十三岁为袁昶作《安般簪集序》，强调“骚人蝉蜕之心”，“小雅明发之志”，“脱落陶、谢之枝梧，含咀风雅之推激”；自言少喜读韩驹陵阳集（见《重刊江西诗派韩饶二集序》），又言“早涉义山、介甫、山谷以及韩门”（《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》），光绪二十四年在武昌与陈衍论诗，同意陈氏三元——开元、元和、元祐之说（见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），

晚年又提出三关——元嘉、元和、元祐之说（见《与金匄丞太守论诗书》），没有提过龚自珍。但我读《海日楼诗集》，觉得其中《姚梅伯画龙女图为黄仲弢题》七绝四首、《遨游在何所行》《听歌》七绝四首、《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赋呈》、《病僧行》、《题沈云画渡海达摩像》、《摩多楼子》、《病山示我鬻医篇喜其怪伟属和一章》、《逸社第七集会于庸庵制军寓分咏京师胜迹得陶然亭》、《题胡愔仲唐人所写金光明胜经卷子》七绝二首、《题赵文敏画马立轴》等诗，颇与其三元、三关的主张不相类，而和龚自珍倒有一脉相通之处，而且比之南社诗人之学习龚诗，反显得有神无迹。这原因何在？最近，看到了沈曾植两篇未刊文稿《书龚定庵文集后》和《龚自珍传》，才看出了沈曾植受龚自珍影响的实据。现在抄出来，供近代文学研究者参证。

《书龚定庵文集后》

才非盛世之所有也。盛世之民，浑浑淳淳而已，中声以为言，中制以为行，中气以为养，无过听之声，固无荡心者为发其声也；无眩视之色，固无有耀神者以发其色也。才之兴，其于中古乎？智与愚角，智又与智角，尤智者又与群智角，其间有通天人、齐古今之智者出，则又与尤智者角，尤智者或抑首喙气，不敢与角焉，于是才之量成，而才之事亦极。其声非寻常之声也；其色非寻常之色也；其回薄激宕，江海不足以为深，山岳不足以为高，群天下魁儒硕学、长德伟人、大豪大奸邪、大盗大猾，震之、骇之、颂之、赞之、摈弃之、绝之，而其幽灵殊异之心，疏通知远，体物无遗之智，如电入物，如水注地，积微造微，泯然藏密，不可思议。呜呼，古之狂者与？狂者不知□声之□□如此否也？其亦所谓狷者与？其于世道不为有补，亦不与无益之秕言比。圣人不可作矣，斯人之才，吾不知居古者何等也？吾心所独，其

受之吾心，若有充然满志者。爰题其后，以讯世之知言者，以为此定庵之才，数百年所仅有也。

此文是沈氏早期作品，对龚自珍的推崇，可说是至矣尽矣，无以复加矣，出之“同光体”诗人沈氏笔下，更令人惊讶。文章指出了“才非盛世之所有”，贬斥盛世中道而行，“无荡心者以发其声”、“无有耀神者以发其色”；肯定了才之兴在于中古，必须是“通天人，齐古今之智者”与一批“智者”、“尤智者”相角，而“尤智者或抑首喙气不敢与角焉，于是才之量成，而才之事亦极”。这里说的就是龚自珍。本文中“其声非寻常之声也”到“不可思议”，极力写出了龚的成就与影响，最后得出“定庵之才，数百年所仅有也”的结论。对龚自珍这样地馨香膜拜，不但近代“同光体”诗人所未有，就是各种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作出这种“顶峰论”。在这里，我们就不难理解沈氏诗集中某些作品受龚诗影响的脉络了。这一文献之所以珍贵而重要，就在于填补了近代文学史中的这一空白。

再看另一篇《龚自珍传》：

龚自珍，字璚人，号定庵，一名易简，字伯定，更名巩祚，仁和人。道光九年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升宗人府主事。十七年改礼部，寻告归，遂不复出。父丽正，为金坛段玉裁婿，能传其学，嘉庆元年进士，官至江苏苏松太道，所至有善政，著有《国语韦昭注疏》。自珍幼秉异姿，聪俊绝常伦，博通古今，精六书音韵之学，兼能读蒙古、西番、天竺字书，生平著作等身，出入于九经七纬、诸子百家。其于经通公羊春秋，于史长西北舆地，其为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，以周秦诸子、吉金乐石为崖郭，以朝章国故、世情民隐为质干，尤好西方之书，自以为造深微云。道光十二年，夏大旱，诏求直言，大学士富俊访之自珍，自珍陈当世急务八条。为内阁中书时，上书大学士，乞到阁看本，充史馆校

对，上书总裁，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、山川形势，订《一统志》之疏漏凡二千言；官礼部时，上书论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三千言；其官宗人府主事也，充玉牒馆纂修官，则为之草创其章程。当是时以奇才名天下者，一为魏源，一为自珍。尝著《西域置行省议》、《东南罢番舶议》，时题其言。程同文修《会典》，以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属为校理，自珍因拟撰《蒙古图志》，以同文歿不果成，成《蒙古字类表》、《册降表》、《氏族表》。所为文独造深峻，为一代雄。著有《尚书序大义》一卷、《太誓答问》一卷、《尚书马氏家法》一卷、《左氏春秋服杜补义》一卷、《左氏决疣》一卷、《春秋决事比》一卷、《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》一卷、《典客道古录》一卷、《奉常道古录》一卷、《羽琕山金石墨本记》五卷、《羽琕之山典宝记》二卷、《镜苑》一卷、《瓦韵》一卷、辑官印九十方为《汉官拾遗》一卷、《泉文记》一卷、《布衣传》一卷、《文集》三卷、《续集》四卷、《文集补》二卷、《补编》四卷。晚主丹阳云阳书院讲席。道光二十一年丁父忧，一日暴疾卒，年五十。

这是沈曾植晚年作品，写得概括而精要。交代了字、号、科名、简历、家学渊源，特别指出龚氏“博通古今”的各个方面，以及条陈经世急务、政体宜沿宜革、西域置行省、东南罢番舶等荦荦大者。论述了“是时以奇才名天下者，一为魏源，一为自珍”，赞扬其“所为文独造深峻，为一代雄。”著录其全部著作，而于近世妄人所诬蔑虚构的与西林太清关系，摒不入于传。此文较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中的龚传要完备得多，《清史稿》时杂以贬语，如谓“巩祚才气横越，其举动不依恒格，时近佻诡”，又言“其文字骛桀”，都是微词，与沈传不同。沈氏《龚自珍传》与《书龚定庵文集后》写作时间的距离约有三十六年左右，一书后，一传，体裁不同，而先后所论仍然没有变动，这里又可

以看到沈曾植对龚自珍的推崇是始终如一的。

对龚氏的推崇，也表明了沈氏的识解宏通。近代著名学人对自珍的评论，并不是都象沈氏这样的。第一是章太炎，《太炎文录·校文士》云：“魏源、龚自珍则所谓伪体者也。源故不学……自珍承其外祖之学，又多交经术士，其识源流、通条理、非源之侪，然大氏剽窃成说而无心得。其以六经为史，本之《文史通义》，而加华词，观其华，诚不如观其质者；若其文词侧媚，自以取法晚周诸子，而佻达无骨体，视晚唐皮、陆且弗逮，以校近世，犹不如唐甄《潜书》之近实。而后生信其眩耀，以为巨子，诚以舒纵易效，又多淫丽之词，中其所嗜，故少年靡然向风。自自珍之文贵于世，而文学涂地垂尽，将汉种灭亡之妖耶？”

《与人论文书》自谓“未尝薄姚鼐、张惠言”，“夸言稍少，此近代文所长，若恇敬之恣，龚自珍之僣，则不可同论”。第二是王国维，《人间词话》云：“艳词可作，唯万不可作僣薄语。龚定庵诗云：‘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’其人之凉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。”与太炎同以“僣”贬龚作，而王语更进一步作了人身攻击。王氏通西方美学、哲学，极崇拜沈曾植的学术文章，而对龚自珍的评论，褒贬大不一样，由此亦可见沈曾植识解之不易及。以上评述了沈氏二篇未刊文稿，据此可看出沈氏的观点，至于沈对龚氏一意推崇，而不曾一分为二地对待，那是另一问题，这里不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州大学中文系